

伯格曼“焦点生活”观念的存在论解读

谭泰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存在论技术哲学肇始于海德格尔对于物-世界和技术本质的追问,伯格曼沿着海德格尔的路径,试图以“焦点生活”观念重建人-技术-世界的关系,揭示和批判当代生活的技术症候。技术装置以机器化与商品化的方式瓦解了人与世界的深度交往,成为衡量一切事物及价值的“范式”。面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后果,自由民主在道德责任和政治行动上保持中立和缄默不语。针对于此,伯格曼主张在个体及社会实践层面重建“焦点生活”视域中的交往情境、话语-意义和主体间性,为批判技术规则、转变物质环境、重新定位美好生活及意义提供了存在论基础,由此彰显了存在论技术哲学的批判性、建构性和实践性特质。然而,技术哲学的当代转向似乎愈加呈现出一种悬置存在论问题或“去批判化”的趋势。因此,存在论技术哲学要体现其当代价值,亟待在方法上反思自身的应用伦理化或 STS 化,在进行技术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时避免走向道德相对或绝对主义,应结合具体的文化及制度背景来审度技术问题,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意识形态争论。

关键词:阿尔伯特·伯格曼;焦点生活;存在论;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2)05-0001-09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技术问题纳入存在论领域,开启了对技术本质的哲学追问。此后,“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技术是构造人和世界的环节”,^[1]这些技术哲学观念逐渐为学者所讨论及广泛接受,表达着“在世之中(being-in-the-world)”的人们如何通过技术来与现实世界打交道,技术如何塑造人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和意义,以及人们如何从整体上反思技术对个体生存境况与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存在论关切。美国技术哲学家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他基于“装置范式(device paradigm)”来批判现代技术,围绕“焦点物-实践(focal thing and practice)”来追问生活世界的意义,为重新定位人-技术-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具有丰富理论及实践蕴含的“焦点生活(focal life)”观念,^①被阿特胡斯(Hans Achterhuis)视为“北美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重要代表之一。^[2]米切姆(Carl Mitcham)在《阿尔伯特·伯格曼和中国》^②一文中提到,“他对技术物质文化弊病的诊断以及为此开出的药方,对于当今的中

收稿日期:2022-05-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64)

作者简介:谭泰成(1995—),男,广西来宾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在伯格曼那里,“焦点生活”是这样一种朴素的生活世界图景:“焦点物”作为占据家庭中心位置、凝聚劳作的手段与目的及其过程的器具,人们围绕这些器具的活动则是具有负担性和交往性的“焦点实践”。“焦点物-实践”融合了自然与文化,联结着人的身体感知力与行动力,构造了具有定位力量的“焦点生活”世界。伯格曼列举的焦点物有荒野山脉、壁炉、艺术作品与博物馆、运动场、教堂、乐器、餐桌等,与其相对应的焦点实践有探险、取暖、艺术鉴赏、跑步或体育运动、教堂礼拜、乐器表演、家庭烹饪等。以壁炉为例,在古希腊人的文化和生活世界中,当把婴儿抬到壁炉边时,他/她就真正地与家人联系在一起了;在罗马人的文化和生活世界中,壁炉代表着神圣,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在美国文化中,壁炉通常位于房子或家庭的中心位置。参见 BORGS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96。这说明,“焦点生活”情景构造具有不同的文化向度。

② 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者对伯格曼的思想洞见进行了持续阐释和发展,例如,通过重构伯格曼的“装置”“焦点物-实践”概念,主张在智能装置、在线教育和操作界面中嵌入物质及价值调节因素,进而改善技术设计、研发及使用的消费主导模式,促进人与技术良性互动。关于中国学者对伯格曼的研究进展,米切姆在《阿尔伯特·伯格曼和中国》一文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参见卡尔·米切姆:《阿尔伯特·伯格曼和中国》,陈雨晴译,《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国社会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3]⁴ 伯格曼的“焦点生活”观念对于批判狭隘的技术理性思维,建构和发展存在论技术哲学理论,以及反思消费性技术生活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一、“焦点生活”观念的存在论技术哲学渊源

存在论技术哲学肇始于海德格尔对于物-世界和技术本质的追问。在海德格尔的物-世界概念中,物具有显现和融合世界的存在论地位,人在事物聚集(gathering)其情境中与世界产生联系。伯格曼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这种“在世存在”或“在世之中”称之为“与现实的交往”(engagement with reality),以此表明“我们与事物及其世界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4]⁴¹ 海德格尔认为,器具(物)^①是“在操劳活动中照面的存在者。”^[5] 伯格曼进一步深化了海德格尔对于器具的描述,人对器具的制作与使用体验,是在身体、生产和社会层面与世界的深度交往。器具作为典型的物,具有定位力量和聚集特征,器具的使用体现了当地的制作和文化传统,并塑造着当地人的生活与交往方式。^② 这与海德格尔在《物》中对于壶展现其世界的描述方式是一致的。^[6]¹⁷²⁻¹⁹¹ 伯格曼认为,“通过这些方式,事物(与它在词源上的最初意义相一致)聚集并揭示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四重性质,即天、地、人、神的相互作用。”^[4]¹⁹⁸ 在物-世界的交往情境中,维持着人们“在世存在”的身体参与、专注度、技能训练、成员协作和道德责任等要素。

然而,现代技术转化了这种建构生活世界的朴素方式。技术哲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将技术问题纳入存在论领域。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技术的本质不在于技术物及其总和,而在于“解蔽”。技术物与技术本质之间具有“存在论差异”,^③“座架(Gestell)”揭示了现代技术将一切事物转化为“持存物”的本质特征。^[6]¹⁸⁻²⁵ 针对现代技术对物-世界的转变,伯格曼以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念为基础,并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概念,将现代技术描述为与现实交往的方式,即“装置范式”。^[4]⁷⁶ 杜宾(Paul Durbin)因此将伯格曼视为“新海德格尔主义”(Neo-Heideggerian)的技术哲学家。^[7] 不过在伯格曼看来,海德格尔“反对如下主张,即文化现象具有多面性以至于不能显现出一个明确特性。他还反对反本质主义者关于文化现象特征的社会建构观点”,^[8]与海德格尔一样,伯格曼也否认自己是建构主义者,将技术视为塑造当代生活特征的支配性力量。正因如此,其“装置范式”概念常常被解读为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但是,将伯格曼视为海德格尔主义者或本质主义者都是值得商榷的。具体来看,“装置”概念由机器和商品构成,^[4]³³ 比起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似乎更能具体地描述现代技术与人的经验关系。同样,尽管伯格曼继承了海德格尔关于物-世界的存在论描述,但其思想趋向仍然是基于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他认为,将思想和行动转向朴素的“焦点物-实践”,不是要逃离技术,而是要肯定技术。

一方面,海德格尔主张在前技术(pre-technological)范围寻求与“焦点物-实践”相遇,在伯格曼看来,这是误导的和令人沮丧的,因为技术情境已经改变了“焦点物-实践”的情境,前技术条件下的生活世界让位于技术理性逻辑。针对于此,伯格曼主张将恢复“焦点物-实践”的改革方案延伸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从而使“焦点物-实践”具备社会、伦理和政治的实现条件。他认为,这是海德格尔所没有考虑的。^[4]²⁰⁰ 在这一点上,与其说伯格曼是“新海德格尔主义者”,不如说其方案更具有哈贝马斯的思想风格,即试图在以交往为

① 在海德格尔看来,器具(书写、缝纫、加工、交通、测量等)是人在其世界中进行劳作与交往所使用的东西。他还将器具理解为“上手之物”,例如斧子,其“上手性”表明,人在平日的使用中不会去注意它;而当斧子损坏时,它才捕获了人的注意力和精力。

② 伯格曼对此描述道,壶作为一种陶制器具,由泥土制作而成,它聚集着天空中的雨水和阳光。壶的使用方式融合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精神要素。“人们在中午时分到地窖去取一壶自己熟悉年份的佐餐酒,在那里,人们会在午餐时斟满美酒,并心怀感激。”参见 BORGS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199.

③ “存在论差异”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区分了“存在”(“是”)与“存在者”(“是者”)。简单说,“是”先于“是者”,这种在先在的结构层级就是“存在论差异”。而技术物与技术本质的“存在论差异”简单说,就是技术使得潜在的转化为现实,“是”转化为“是者”,存在转化为存在者。技术就其“实际性”“时间性”而言,显现着“存在论差异”。原初的“本真技术”(伯格曼意义上的“焦点物-实践”、海德格尔的“器具”、芒福德的“生命/民主技术”)保持着存在论差异,而人与物-世界具有一种一般的、交往性的联系。但现代技术统治消解了“存在论差异”,导致人们没有思想(反思能力)去区分和辨识具体的(存在者意义上的)技术物和一般的(存在意义上的)技术本质。人的存在(此在)“被视为一种并无特异之处的存在者”,参见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5-158页。

目的的(“焦点”)生活世界领域与以工具理性为目的的(“装置范式”)“系统领域”之间保持平衡。^{[4]97-101}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作为形而上学历史的最后阶段,将技术哲学提升到存在论层面。但面对技术命运,海德格尔认为拯救之道是艺术和思考,以及对简单事物的回归。^{[6]35}伯格曼则试图通过揭示现代技术的“确定”特征,来寻求能够对技术生活世界及社会秩序进行改革的方案,其方案以如下观念为基础。首先,人-技术-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关系是“历史性”的,因为“装置范式”对“焦点生活”的支配是在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它并非适用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其次,这种关系是“动态性”的,因为“装置范式”并没有立刻转变所有现实,而是让这个世界从某个地方实现机器化和商品化。^[9]伯格曼对于“装置范式”的历史性与动态性的分析,表明将他视为本质主义者是一种误解。

从方法上看,尽管伯格曼并没有直接或专门讨论过“物的意向性”等技术现象学的关键观念,或像伊德(Don Ihde)一样,将技术问题后现象学化,但伯格曼的“交往”概念“表明了一种特定的意向模式,一种人类与其世界之间的特定联系形式。”^{[10]57}在这个意义上,他运用了现象学方法来揭示技术-生活世界的日常性(everyday life)和具体性(concreteness)等存在论特征。他认为,现象学方法为描述现实和技术使用的方式提供了三种“证据”。第一,它稳固人的直觉,使得人们可以询问经验现实的实质性问题。第二,它规范技术的使用模式,确保技术得以负责地使用,以实现卓越的追求。第三,它与社会科学结合,用于审视特定社会行为或特定文化的特征。^[11]伯格曼将其用于对技术与现实、技术与道德、技术与文化的批判中。但维贝克(Peter P. Verbeek)认为,“伯格曼并没有充分利用其方法(指现象学)的潜力,他对于技术装置阻碍人们交往、技术信息威胁人类与现实互动的诊断,并没有充分、公正地对待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作用。”^{[10]62}维贝克的确指出了伯格曼在追问技术本质中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忽视了伯格曼进行技术批判的存在论前提。这一重要前提表明,前现代的“焦点生活”与现代的技术生活之间发生了断裂。通过分析这一断裂,伯格曼把握到了技术生活的困境及其症候。

二、技术瓦解“焦点生活”:存在论技术哲学的批判性

现代技术的兴起隐含了人们要求解除负担、获得自由及繁荣、追求美好生活的存在论承诺,进而瓦解了人们围绕焦点物与现实交往的“焦点生活”图景,取而代之的是与前现代发生断裂的技术生活世界。这种断裂成为存在论技术哲学批判的重要切入点,具体来看,“装置范式”强化了以个体虚无、家庭及社群文化衰退、劳动异化、环境污染和公共政治缺乏活力为代价的技术生活“特征”。^①因此,在“焦点生活”中人与现实的深度和多维的交往,坍塌为由机器化与商品化所实现的技术可用性(availability)。技术可用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和行动价值的标准,反映了根据“物质的规则及其支配性(material rules)”^[12]所建立起来的技术秩序,并塑造了由机器与商品、劳动与休闲、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裂而成的技术生活图景。概言之,技术可用性解除了感知与行动力、身体与环境(现实)、卓越与愉悦、付出与责任、劳作过程与最终产品在焦点物-实践中的联结,^②这种前现代的交往联结与现代的技术可用性发生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断裂。

技术在“装置范式”的主导下,瓦解了制作(make)和使用(use)统一的“焦点生活”图景。投入到“焦点实践”被视为是多余的,因为不需要去制作一把木椅,而只需要在网上购买成品就能安心使用。这种使用是效用性的,不用付出任何努力,不要求对于事物的照顾、修复、技能练习以及身体参与。同时,日益复杂的机器排斥人们的进入和理解,商品的纷繁通过广告和市场权益制造出自由假象,但实际上却限定了选

^① 伯格曼使用“特征”而不是“本质”来描述技术,这是他与海德格尔所不同的。伯格曼在这个意义上用“装置范式”来辨识和批判技术主导人与现实交往的当代生活特征。米切姆对此评论道:“‘特征’是一种介于实体和偶性之间的现象。……‘特征’不像‘本质’那样稳固,但也不是完全偶然性的。……特征可以被改变,但过程艰难,需要付出努力。”参见卡尔·米切姆:《阿尔伯特·伯格曼和中国》,陈雨晴译,《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5页。

^② 例如以跑步机、外卖、电视机、标准化生产的啤酒和面包为例,在伯格曼看来,都是作为机器和商品的装置,其可用性取代了户外跑步、家庭餐餐及讨论、本地原料供应及生产的面包和酿造的啤酒等焦点物-实践。

择。伯格曼对于“装置范式”支配性规则的批判让米切姆产生共鸣,“我们似乎没有系统地、有选择地发展和使用技术的能力,我们很容易被刚上市的产品或最新的文化潮流俘获。”^{[3]5-6} 尽管技术界面对于普通用户变得越来越“友好”,操作简单易懂,但技术情境是无个性特征的或是匿名的,这种“友好”背后的机制(machinery)仍旧排除大多数人的理解,甚至技术员也不能完全理解技术系统的“黑箱”。因此,“焦点物-实践”构造的人与环境的多维联系被隐蔽的机器所取代,而由机器提供的商品以远离现实的方式在技术环境中获得和享受,这就是当代生活所面临的“技术反讽”(irony of technology)。

前现代“焦点生活”的瓦解也标志着“现代主义”的兴起,^①伯格曼从存在论技术哲学层面批判了西方自由民主对于技术观念的悖谬。技术的存在论承诺根植于征服自然和实现科学城邦的观念中,并转化为塑造社会生活方式及政治秩序的支配性力量,当代政治已成为技术社会的“元装置”(metadevice)。^{[4]34} 自由民主在技术与美好生活观念上的价值中立预设无法回应阶层分化、工作满足感缺失、文化倒退、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等问题。^② 如伯格曼所言,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想要把物质文化一事委托给消费者的至高无上权威。”^[13] 自由民主迎合技术,却以不干预个体美好生活观念的价值中立形象忽视对于技术社会问题的道德责任。概言之,选择何种生活方式,使用不使用技术,是由个体自己所致。因此,“技术反讽”加剧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隔离,消解了“焦点生活”世界的“存在论”根基,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事物、家庭成员、社群以及当地的文化、庆祝活动和公共事务之间的交往情境、紧密关系和庄严性。在“焦点生活”世界中那些看似朴素的事物及交往要素,恰恰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增强家庭成员及社群凝聚力、激发当地社会组织活力、提升国家责任与公共参与的存在论根基。

面对前现代“焦点生活”的瓦解,只有从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挑战装置范式的主导地位,才能够重提美好生活问题和转变物质规则。因此,“焦点生活”观念预设了一种集体行动的道德责任。阐明这种道德责任,可以进一步稳固存在论技术哲学批判的价值基础。如伯格曼所言,“我们被自己的建造物所影响,其影响方式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强制的,因为我们总是假设公共结构是这两种影响方式中的一种。我们对建造物的中间力量视而不见,从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总是已经参与到对一种公共生活方式的描绘中,必须对这一事实负责,必须询问自己所描绘的生活是美好的生活、体面的生活,还是可悲的生活”。^[14] 重提美好生活并非拒绝技术,而是批判自由民主的道德悖谬——以价值中立和个人主义之名推卸对于技术后果的责任,并致力于重建“焦点生活”的视域。

三、重建“焦点生活”视域:存在论技术哲学的建构性

伯格曼通过“焦点物-实践”的情境构造和话语-意义呈现来重建“焦点生活”视域,体现了存在论技术哲学的建构性特质。首先,“焦点物-实践”构造了“焦点生活”的交往情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赖于特定器具、时间、地点和社群。“焦点生活”的交往情境呈现为一个具有中心位置和协调性的环境布局,而践行“焦点生活”的过程则是涉身性和负担性的,要求人付诸一定的注意力、体力、努力、协作和技能。^③ 伯格曼认为,卸除负担显然成为了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技术生活方式的原因。技术手段完全将注意力转化为对商品的获取,打开技术装置的开关按钮,即可获得商品化的效用及便捷服务。但是,正是由

^① 伯格曼分析了现代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即“侵略性的现实主义”“方法上的普遍主义”“意义含糊的个人主义”。参见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57页。

^② 自由民主的显著立场在于强调国家不应当干预个体的美好生活观念,政府的任务仅仅在于为个体提供实现自由、繁荣和正义的中立手段。但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无法从对技术的暧昧态度中抽身。因此,他们对于技术与美好生活观念的价值中立态度是矛盾的,目的在于为政府、国家和技术公司免除掉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道德责任。

^③ 伯格曼认为,在被中央供暖系统取代之前,壁炉占据着美国家庭生活的中心位置,与客厅、餐桌等设施,以及餐食烹饪、上餐、仪式和谈话等焦点实践活动相融合,共同营造出浓厚的、亲密的家庭氛围。伯格曼经常举的例子是:为获取温暖,壁炉的准备过程使得每一位身处其中的家庭成员参与到对应的活动中,如母亲生火,孩子填木,父亲伐木。每个成员要面对着各种自然条件以及承担着各种任务,把各种技能的应用、协作与对日常事务的尽责交织在一起。然而,这种古朴的生活方式被现代技术所拒斥。

于这种具有“负担性”“威严性(commanding presence)”的“焦点物-实践”,人与现实的互动才是丰富、持续、活泼和充满生命力的,这与技术及商品消费快感是不同的。伯格曼捕捉到了在“焦点生活”情境中重要的技能、相互协作、磋商、组织、责任担当、文化传承等交往要素,这些要素如今消解在迷失的现代性和技术生活中,伴随着个体、社群和政治文化的衰落。因此,伯格曼主张通过设计城市焦点建筑、举办城市马拉松、复兴传统节日庆祝和振兴工艺行业来重构物质环境布局,增强人们与其居住的社区、城市和自然环境的融合。^{[15]37}我们塑造(建筑)物质环境,(建筑)物质环境也塑造着我们。

其次,“焦点生活”的意义根源于“焦点物-实践”的情境构造,并由“指示话语”(deictic discourse)呈现。Deictic 在希腊语中具有“展示”“指出”“揭示”“呈现”,以及“解释”“引导”之义。^{[4]178}伯格曼认为,有必要弄清楚“哪些事物是决定性的?我们如何学会倾听事物。”^[16]“指示话语”体现了“面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原则,结合这种现象学原则,伯格曼揭示了“焦点生活”的意义如何在涉身性、协作性和交往性的实践情境中构建。在伯格曼看来,“指示话语”不同于科学话语和技术话语。科学话语是对现实的必然解释(apodeictic explanation),依靠精确的演绎形式和经验确证;技术话语的范式解释(paradigmatic explanation)则是技术装置对现实的控制、转变和支配。^{[4]67-78}“指示话语”不同于科学话语和技术话语,一方面,“指示话语”向人们展现技术的局限,传达“焦点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指示话语”告知他们如何适当地认识和接受技术生活方式,更为关键的是,如何维持热情、耐心和专注力,进而投入到具有多元意义的“焦点物-实践”中。简言之,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技能、所处的社群,构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焦点生活”的意义呈现方式是多元的。^①

“焦点物-实践”呈现生活世界意义的方式涉及热情、同情、宽容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范畴,^[17]是不同生活经验之间达成相互理解的可能基础。也就是说,为保证不同个体在生活共同体中达成“共识”,“焦点生活”观念的建构蕴含主体间性原则。主体间性是指我们处于一种相互共属的人际关系中,^②我们不能离开这种关系来理解自己和他人。^[18]具体来看,“焦点生活”的主体间性原则以公共的“指示话语”为基础,并在社会生活领域转译为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制定。第一,该话语指引不同个体就技术的公共问题展开协商与讨论。第二,该话语的诉说者不会强制赋予其所诉说内容以有效性,而是从他人对善、勇气、正义和责任的理解,去指示人与事物、社群交互的重要性,并对不同的“焦点物-实践”方式保持宽容。第三,该话语呼吁热情、宽容和同情等品质。热情使得人们给“焦点物-实践”以肯定和投入,同情使“焦点物-实践”具有吸引力,意味着诉说者不仅要以某种方式陈述自身重要的事情,还要在特殊情况下倾听和包容拥有不同“焦点物-实践”体验的听众。^{[4]180-181}通过“焦点生活”观念的主体间性,伯格曼试图克服根植于自由民主观念中的“意义含糊的个体主义”。^{[13]45-57}

最后,“指示话语”确保公众共同投入到“焦点生活”行动中。伯格曼认为,关键在于提升公众对物质文化安排进行充分讨论和干预的能力。一方面,重构技术和民主的模糊承诺,由此限制“装置范式”的技术话语。同时,通过“指示话语”来重建“焦点生活”的公共参与维度,确保“焦点物-实践”的多元意义可以被公众所审视和理解,从而激发公众从局部到整体层面转变物质文化的共同理解力以及“在文化、政治、情感、交往和磋商方面的行动条件。”^{[15]39}另一方面,将“焦点生活”的主体间性原则转化为公共参与议程,克服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局限,重构出一种能够将朴素的“焦点物-实践”纳入到物质文化安排中的公共参与形式,伯格曼称之为“公共政治(communal politics)”。^[19]从这个角度看,“焦点生活”的存在论视域

① 如何才能理解或认可“焦点生活”的多元意义呢?伯格曼指出,“指示话语向我们揭示一些东西并得到我们的响应,促使我们行动起来”,参见 BORG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80。首先,该话语可以争论,它不是控制而是向公众开放其主题。其次,该话语表明,讨论“焦点生活”的话语方式不是主观独断的,而是从谈论者指向所讨论的事物,并将所呈现的意义从个人的焦点实践辐射到社群的共同庆祝和公共生活中。

② 舒茨(Alfred Schutz)的社会世界现象学分析表明,世界对于你/我/他而言,不是私有的,而是一个共同的主体间性世界。“只有从面对面的关系,从‘我们’世界的共同生活经验,才能构成主体间性世界。”

最终转化为对技术文化和物质环境进行改革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揭示了伯格曼技术哲学的伦理与政治维度。^①

四、“焦点生活”观念的意义与局限:存在论技术哲学的实践性

“焦点生活”观念从侧面折射了不断加速且不可逆转的技术生存方式,拓展了存在论技术哲学理解人-技术-世界关系的视域。我们认识到,技术提供便利和舒适的同时,也掩盖或模糊了其功能和意义。技术装置塑造和限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道德抉择,人们将生活的繁琐内容交由技术完成,却不知道技术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似乎也不需要去了解。我们的生活内容被压缩和量化为一种“非交往(disengage)”的技术消费生活。在“装置范式”塑造的技术社会中,商品集合构成了技术前景,加剧了消费生活与技术自由的幻想,一切事物及行动不需要人去关心和维护,而只需要交由技术去完成。“焦点生活”观念折射了这样一种困境:技术既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使人分心的力量。消费由技术背景支持(机器与劳动),由技术提供的商品具有即时性、易用性,以及理想情况下的安全性。但同时,机器和商品的隐蔽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人的技能、主动性和责任的丧失。伯格曼认为,我们与技术的关系集中反映在技术商品的广告宣传和消费行为中。各式各样的科技广告把技术前景理想化,广告使得技术承诺变得具有吸引力和不可抵抗力,它们的广告设计和宣传为技术产品的创造与新奇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界面和修辞。

因此,“焦点生活”观念呼吁人们与技术保持适度距离,通过涉身性的参与和投入,增强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存在论技术哲学提供了一个日常实践性视角,在技术消费生活中,我们与现实的交往已经成为了按动装置按钮和转动开关的手段-目的关系。只要我们还对科技着迷,就会以商品的名义,努力去寻找那些能够减轻我们负担的装置。伯格曼的忧虑有着几分远见,尽管这些技术装置解除了人们的负担,但人与物的关系只有一种效用关系。这种效用性伴随着技术功能的完善而增强,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对技术着迷、陷入技术逻辑的原因。“焦点生活”观念提醒人们,重建人与事物之间的交往情境,需要对人-技术世界的关系进行存在论反思,但又不止于思辨。重建“焦点生活”观念也是对人-技术关系的存在论反思,“焦点物-实践”把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身心技能、家庭责任交织在一起。在技术加速主义的今天,我们应当把技术装置放在生活的边缘,而不是中心。重建家庭生活的餐桌文化,通过支持当地的农作物种植和贸易来构建当地自然、文化和经济的紧密联系。^② 伯格曼的呼吁尽显浓浓怀旧情结,却非常重要,重建餐桌文化等此类“焦点物-实践”可以增强家庭成员的密切联系。手机(及外卖)把家庭成员的联系“分割”在不同区域,应当转变人与技术之间的这种消费主导模式。

“焦点生活”观念有助于反思技术社会的“生态观”,从而促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存在论审视。伯格曼认为,以荒野为代表的自然生态有其自身“话语”及其重要性,人们可以通过荒野,认识到技术对“焦点生活”的挑战。尊重自然不再源于利己主义,而是对事物本身的认可。^③ 在“焦点生活”的生态观中,自然环境有其自身话语,这与生态伦理所强调的内在价值性、整体性和复杂性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这种生态伦

^① 伯格曼重建“焦点生活”的改革方案隐含了转变技术文化的政治和伦理诉求:“通过对技术与民主的政治哲学批判,重提在自由民主中未被言明的美好生活问题;通过对技术与美好生活观念的伦理反思,构建关于技术文化的伦理原则。”参见谭泰成:《伯格曼技术哲学的政治与伦理向度》,《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5期第36页。

^② 伯格曼呼吁人们应当去精心准备一顿饭,通过涉身性地参与到整个过程,产生持续性的快乐和专注。他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消极性的变化,即外卖或快餐的便利取代了交往性情境。人们认为准备这样一顿饭过于麻烦,因而总是选择速食、外卖或出去吃,无形中消解了维系家庭成员及文化的重要内容。

^③ 在伯格曼看来,通过“倾听”自然、荒野事物及其“指示话语”,可以辨识哪些谈论自然的方式是失败的。他认为,我们在开发自然、保护自然方面的失败原因在于:自然的话语和推理方式最终被技术话语所颠覆,参见 BORGS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86。伯格曼的“焦点生活”观念提醒我们,无论以何种物质上可持续的方式生活,我们总是已经接受了技术。但是,接受技术的生活方式不代表一定要剥夺自然生态的话语。荒野告知人们不仅要接受技术,还要限制技术。

理观会以诸如复杂性或多样性等形式特征的名义来保护野生自然。可问题在于,人们也可以质疑复杂性本身的价值。像美、稳定和完整这类本质价值,能否为保护自然提供正当的理由?能否为决定自然中哪些部分应该受到保护提供标准?在伯格曼看来,传统的“美”的观念已经遭受了启蒙运动 and 技术的侵蚀,因而无法提供这样的保护标准。^{[4]187}人们只有通过“聆听”和敬畏自然的话语,才能够通过明智的方式限制技术行动,重新定位自然生态与技术效用的工具性关系。存在论技术哲学的“焦点生活”生态观对于反思全球性气候生态与地方性生态治理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焦点生活”观念有助于审视技术社会的休闲观。在“装置范式”主导下,越来越多的装置、商品和消费充斥休闲领域。人们愈加远离与现实的切身交往,沉迷于虚拟世界。随着自动化智能技术的发展,休闲不仅仅作为一个需要社会制度和政策安排的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存在论问题,关切着人们如何在不能离开机器和智能设备的情况下来决定其行动、处置其时间、构建生活的意义以及展开与现实的交往。在未来,人们可能会将大量工作和生活内容(例如艺术、交易、教育和社交等)转移到“元宇宙”中,休闲与劳动的界限会面临更为激进的重塑。“焦点生活”与这样一种休闲观相一致,即“摒弃劳动与休闲二分,从人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层面,把休闲理解为人们在感到身心自由的前提下所拥有的一种心态。”^[20]伯格曼认为,“焦点生活”的休闲是通过卓越而不是技术消费来衡量的,人的卓越是通过衡量复杂程度、智力、记忆力或其他方面建立起来的。伯格曼对卓越的规定包括受教育程度(例如对世界的科学结构的了解)、参与公共生活或政治的热情、专业知识状况、艺术鉴赏与实践程度、人的同情心等。

为了重建“焦点物-实践”在技术生活中的中心位置,伯格曼通过所谓“技术改革”,^①试图把总体的装置范式,“包括机器和商品,限制为仅仅作为手段的地位,让焦点物和焦点实践成为我们的目的。”^{[4]220}但其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存疑的。如芬伯格所言,“到底是谴责技术的精神,还是技术本身,伯格曼的论证同样摇摆于二者之间。”^[21]伯格曼反对技术工具论,因为这种论调预设了“手段-目的”的二元框架,“忽视并倾向于掩盖更深层次的文化现实”。^[22]在伯格曼看来,这种“文化现实”就是由“装置范式”所塑造的技术文化,因此技术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中立手段。但是,当伯格曼讨论装置技术在“焦点生活”中处于什么位置时,他将技术限制为以促进“焦点物-实践”为目的的手段,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又成为了一种服务于“焦点物-实践”的手段。可见,伯格曼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按照“手段-目的”的批判框架去规定装置技术与“焦点物-实践”的关系。

“焦点生活”观念在限制或完善技术的态度上模棱两可。伯格曼的“焦点生活”观念主张限制装置技术,进而扩大焦点技术的范围。如果是限制技术,那么伯格曼区分装置技术与焦点技术的论证效力将面临质疑,并忽视了调控技术的民主与伦理潜力。如果是完善焦点技术,那么如何才能判断焦点技术与装置技术的界限?实际上,“焦点生活”观念的“指示话语”及其主体间性原则并不能绝对保证公众、政策制定者或者技术设计者采纳关于焦点技术与装置技术之间的评价及划分标准。概言之,伯格曼所提供的标准在技术文化中缺乏信服力。^②他坚持认为装置技术不同于可以产生“交往”性质的“焦点技术”。但问题仍旧在于,其改革方案中并没有清楚地解释“焦点技术”的辨识标准,从而带来实践层面的巨大困难。如果“焦点生活”视域的重建以对“装置范式”的认识和改革为条件,那么,在“焦点生活”中限制技术,必须以挑战装置范式为前提;而要挑战装置范式,又要限制技术在“焦点生活”中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看,伯格曼似乎陷入循环论证中。

^① 在“技术改革”方案中,伯格曼区分了作为装置范式的技术(“装置技术”)与作为手工艺生产的技术(“焦点技术”)。在他看来,前者导致消极的消费性技术生活,后者引导积极的“焦点生活”。虽然不能否认装置技术的作用,但这类技术只能作为特定生活及活动领域的工具性手段,消费性技术生活不能作为生活世界的目的和中心意义。而以融合技能与身体、自然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手工艺技术,通过“焦点物-实践”促进个体卓越、维持家庭氛围及改善社群文化。

^② 通过是否促进人与现实的交往来区分技术实践与“焦点物-实践”,伯格曼认为,信息装置技术消解了人与环境的真实互动。但正如维克所指出的,信息技术调节了人与现实互动的环境。这种调节既是对人的调节,也是对环境的改变。参见 VERBEEK P P. Devices of engagement: On Borgmann's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02(1): 48-63.

五、余论：存在论技术哲学走向何处？

“焦点生活”观念凸显了存在论技术哲学的批判性、建构性和实践性。当下的“经验转向”进路实现了对具体技术进展与人的生活经验塑造之间的精致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哲学伦理反思与现实技术创新之间的鸿沟。荷兰或美国的技术哲学家提出“多次转向”有其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但主要致力于与批判的或存在论技术哲学“割席”，多年来，我们也紧随其后汲取理论养分。但问题也渐渐显露，技术哲学研究似乎逐渐悬置了“通过对技术本质的理解来反思人的生存处境”的存在论关切问题，^[23]或如米切姆所言，陷入到“关注小问题而远离大问题”的琐碎之中。^[24]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哲学理论需要在经验转向与存在论之间保持研究张力，“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而应加强技术哲学界与工程师团体的对话交流，参与解决技术实践中面临的具体哲学与伦理问题。”^[25]的确，无论是技术需要与哲学对话，或是哲学渴望介入和亲近技术，对于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技术时代，行动更需要存在论的根基，而不是仅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消解它。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忧虑，本文以伯格曼的“焦点生活”观念为切面，从存在论角度重新解读他对于技术主导现实所进行的整体性批判，由此彰显了存在论技术哲学致力于重建技术与生活世界意义的价值底蕴，对于我们在当下和未来、在理论和行动中审慎地接受技术，反思加速主义生活，极具启发意义。

然而，“焦点生活”观念也折射了存在论技术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挑战。首先从社会改革角度看，“焦点生活”观念对于伯格曼挑战“装置范式”以实现技术改革的目的来说是不充分的。如果“焦点生活”观念所确立的“指示话语”与技术话语无关，又如何通过限制技术或发展“焦点物-实践”来推动公共政策的转变呢？这就意味着，存在论技术哲学既要拉近与社会政策和技术改革的距离，也需要在方法上反思自身的应用伦理学化或 STS 化。^①其次从多元性角度看，“焦点生活”多元主义和消费“个体主义”之间能否协调起来？“焦点生活”的多元性在“装置范式”主导的自由民主话语中显得很脆弱和分散，随时面临着被消费“个体主义”淹没的风险。因此，存在论技术哲学在转向技术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时，要避免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因为这无益于确立转变技术规则的集体道德责任。但同时，也要避免一种道德绝对主义的“家长制”论调，因为这会给个体及社会带来过度的道德负担。最后从政治角度看，伯格曼试图调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开被作为“家长制”的批评。^[26]他希望专家和文化精英阶层能够引导公众接受“焦点生活”的方式，进而重塑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选择和物质文化环境，但这种方案难以挑战自由民主语境下的技术和资本逻辑。因此，存在论技术哲学应结合具体的文化及制度背景来审度技术问题，在对于技术的政治哲学批判中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意识形态争论。

参考文献：

- [1] 吴国盛. 技术哲学讲演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1.
- [2] Achterhuis H.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卡尔·米切姆. 阿尔伯特·伯格曼和中国[J]. 陈雨晴, 译.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 [4] BORGS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5]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01.
- [6] 马丁·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7] DURBIN P 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views[M] // HIGGS E, LIGHT A, STRONG D.

^① 在技术哲学的当代转向中，STS的建构、“解释灵活”、对称等方法被应用于对具体技术问题的社会分析中，从将技术-伦理二分转向将技术作为一种伦理设计或将伦理作为一种技术设计，这种 STS 化和应用伦理学化对于当代技术哲学打开技术“黑箱”具有重要价值，但如前所述，悬置了对技术转变生活世界的整体批判性，这种“去批判化”削弱了存在论技术哲学的价值底蕴及特质。因此，如何保持这种一般的存在论关切与具体的技术及社会改革之间的张力，是存在论技术哲学需要不断思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 Technology and the good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43.
- [8] BORGMANN A. Technology [M] // DREYFUS H L, WRATHALL M A. A companion to Heidegger. Malden, MA: Blackwell, 2005: 421.
- [9] BORGMANN A. Reality and technolog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1): 31.
- [10] VERBEEK P P. Devices of engagement; On Borgmann's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J].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02(1): 48-63.
- [11] BORGMANN A. Response to my readers [J].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02(1): 82.
- [12] 阿尔伯特·伯格曼. 物质的规则及其支配性 [J]. 陈雨晴, 等译.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1-4.
- [13] 阿尔伯特·鲍尔格曼. 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 [M]. 孟庆时,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37.
- [14] BORGMANN A. Real American ethics: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our countr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6.
- [15] 谭泰成. 伯格曼技术哲学的政治与伦理向度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1(5).
- [16] BORGMANN A. Stability, instability, and phenomenology [M] // ROSENBERG R, VERBEEK P P. Post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ssays on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New York,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5: 252.
- [17] STANLEY M. A symposium on Albert Borgmann's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C] // DURBIN P.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life. Dordrecht: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14-15.
- [18] SCHÜTZ A.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171.
- [19] BORGMANN A. Power failure: Christianity in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M]. Grand Rapids: Brazos Press, 2003: 60.
- [20] 成素梅. 智能革命与休闲观的重塑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11): 16.
- [21] 安德鲁·芬伯格. 功能与意义: 技术的双重面相 [J]. 计海庆, 译. 哲学分析, 2011(1): 150.
- [22] BORGMANN A. Technology as a cultural force; For Alena and Griffin [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6(2): 354.
- [23] 姚禹. 重新理解经验转向——一种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视角 [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4.
- [24] 卡尔·米切姆. 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重视批判性 [J]. 王闰, 译. 哲学动态, 2021(1): 27.
- [25] 刘永谋, 李尉博. “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6-21(A01).
- [26] ANTONSEN T, LUNDESTAD E. Borgmann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technology [J].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19(1): 98.

Ontological Explanation for Borgmann's Conception of Focal Life

TAN Taic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n ontological view on Albert Borgmann's thought on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egins with Martin Heidegger's inquiry into the world of things and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Following Heidegger, Borgmann clarifies and criticizes the character of technological syndrome with his "focal life" conception, which reshapes the human-technology-world relations. The mechanical and commercial attributes of technological device dissolve the human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and turn it into "technological paradigm". Liberal democracy remains neutral and silent in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political action when confronting technological consequences. Thus, Borgmann reconstructs the engaging contexts, discourse-meaning and intersubjectivity of "focal life", which provides an ontological basis for criticizing technological rules, transforming material environment and orientating good life and its meaning.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ritical, constructive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contemporary turn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seems increasingly to suspend ontological or critical concern, and brings the tendency toward applied ethics and STS. Therefor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should reflect its contemporary value and methodology, and avoid moral relativism or absolutism when discussing technological and ethical problems. Meanwhile, it should evaluate technological problems in light of specific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o prevent endless ideological debates.

Key words: Albert Borgmann; focal life; ontolog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责任编辑: 江 雯)